

陕甘宁边区难民救助历史考察

高小强，臧文哲

(兰州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摘要：延安时期因战争与自然灾害导致大量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给地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制定包括政府与社会联合救助、财政精准赈济、以工代赈等安置和管理策略，帮助难民解燃眉之急，既为边区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人力支持，还为新时代我国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民生保障工作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救助；民生保障

中图分类号：D231；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5409 (2026) 03-0133-06

DOI:10.26979/j.cnki.cn23-1524/f.2026.03.007

在延安时期，受战争及自然灾害影响而产生的大量难民，涌入陕甘宁边区，如何妥善处理难民救助问题，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不断探索救助难民的经验，在妥善安置难民的同时，采取以工代赈等策略，积极动员难民参与陕甘宁边区建设。目前部分学者主要针对社会救助事业的历史经验^[1]、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2]、陕甘宁边区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3]进行研究。本文则主要从外部流入难民救助的视角出发，探析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于难民的社会救助措施及成效，总结其对现如今社会救助工作及民生保障工作的经验启示。

一、陕甘宁边区政府救助措施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难民主要来自陕甘宁边区周边的山西、河南、河北、陕南、甘肃、宁夏等省区^[4] 646-647。面对庞大的难民群体涌入边区，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外来的难民采取了积极安置和优待的政策，深得民心。

(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安置难民救助条例，保障难民正常生活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面对大量难民涌入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使难民生活有保障，1940年3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对难民土地、房屋、生产工具以及相关税收作出明

确规定，减轻难民负担，解决难民自身燃眉之急，增强了难民对边区的认同。边区政府尊重难民意愿，在宽松的准入政策基础上相继颁布《陕甘宁边区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优待移民的布告》《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等条例，采取多种措施确保这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一方面，设法由边区政府进行财政拨款，根据各分区实际情况精准赈济；另一方面，领导各级政府与民众团体动员了广泛的群众参与，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由群众自行筹措粮食和资金，以支持大量涌入的难民。为了使难民能够得到初步安置，1940年3月，边区政府下发《优待移民的决定》，以陇东革命根据地为例，“由陇东专署设立移民站介绍前往，并规定，确因家贫无迁移费者，视路途远近，人口多少，给予每户30~200元路费。缺少粮食、籽种、农具者发动老户借贷，免纳2~5年土地税，酌量减少或免除义务劳动负担”^[5] 641-642。面对难民的到来，当地群众通过自身实际行动为难民提供援助，如1942年12月9日“庆阳县在驿马关小学召开欢迎移民难民大会，会后各机关单位送来猪肉、面粉、蔬菜及捐款，招待移、难民会餐，并发给难民口粮、路费，帮助到指定的地方安居”^[6]。难民初入根据地害怕受到当地群众排斥的不安心理得以平复。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能够让难民在根

收稿日期：2025-06-30

基金项目：甘肃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专项“甘肃文化遗产赋能‘大思政课’建设研究”（2024ZX020）

作者简介：高小强，副教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臧文哲，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据地安定生活下去，引导组织当地群众帮助难民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如“新正县组织 581 个劳力，在 5 天时间里，帮助难民开荒 1 480 亩，并播种 310 亩。至是年底，陇东分区安置移难民 529 户，2 281 人。大多数难民在一二年内即能建立巩固家业，有吃有穿，有些成为边区劳动模范”^{[5] 642}。边区政府按照当时边区各县各分区具体情况分配救济物资以及救济款，直接救济到难民，使难民得以获得一定生活保障，也使一些出于对边区不了解处于观望态度的难民更加坚定了前往陕甘宁边区的决心。1937—1945 年，“仅陕甘宁边区安置难民 26.66 万人”^[7]。在解放战争期间，陇东解放区通过颁布优待难民政策招引难民劳动力，万亩荒山变肥沃良田，粮食实现显著增长，对促进生产发展和解放区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相关条例的颁布保障了难民救

助政策的实施，难民救助工作变得井然有序，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表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依法有效保障人民切身利益的坚定信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光辉的一页。

(二) 陕甘宁边区政府筹措资金，精准救济难民

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难民问题，积极采取措施，特别是在 1942 年西北局召开高干会议后，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按照中共中央对于“生产建设为最基本的任务”指示，切实贯彻优待难民的政策、条例，加强了对难民安置工作的领导力度。通过这些安置措施落实，1943 年的难民户数及人口数量均实现了对 1941 年和 1942 年的超越，难民人口数几乎达到前两年总和的水平。以延安县难民为例，如表 1 所示，延安县难民数量不断增加。

表 1 1938—1942 年延安县难民增加统计表^{[4]602}(主要统计区域：川口区、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共计
户数	249	533	1 137	5 040	1 050	8 009
人口	1 200	1 976	6 090	14 207	6 231	29 704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精确的财政救济措施，引导民众参与救助难民，并积极争取外部救济资金。如“中央政府接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先生请求拨付十万元巨款，救济边区难民”^{[8] 66-67}。国民政府巨款使边区政府能够继续维持精准救济难民，在“1937 年国民政府派员到边区发放了部分救助金，甘肃省拨交边区政府救济款 1.6 万余元；1938 年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拨给边区赈款 10 万元（其中以 3 万作为急赈款），国联防疫大队的兰道尔先生捐给边区 1 万元”^[9]。这些救助资金的注入，不但减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面临的救助压力，而且对于缓解边区难民的生活困难问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自身财政精准救济，将外部救助款项的合理分配，使涌入难民生活得到保障，为难民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在帮助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同时，彰显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凝百姓之心、聚百姓之力、始终坚持贯彻民生问题上的重视。

(三) 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以工代赈，开设难民工厂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救济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共中央的救济原则“在发展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事业上来实行以工代赈”^{[8] 67}，

毛泽东指出：“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助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10] 930}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社会救助的核心在于做好以工代赈的工作。为此在 1941 年，边区政府民政厅发出《关于救济难民的指示信》明确强调：“放赈是消极的一个办法，积极的办法是以工代赈，是帮助生产工具，扩大生产，是动员广大人民互相调节救助，少数救助粮款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11] 262}对救助的对象、救济粮款的用法、救济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有效地指导了边区的救济工作，如鼓励难民组建农业合作社开垦荒地、难民组织起来与当地群众互济互助，在灾荒期间通过种植旱田、兴修水利设施等措施解决灾荒带来的困境。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保障难民生计，贯彻中共中央“以工代赈”的救济原则，决定开设难民工厂，《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将赈款全部拨充边区难民纺织工厂作资金的呈文》明确指出：“呈为呈请将办理边区难民纺织、制革、农具等三厂经费五万元及救济委员会许代委员长世英，于民国二十七年所拨办理边区贫民工厂之赈款十万元，全部转拨为难民纺织工厂资金事。”^[12]边区政府利用赈款为难民开工设厂，使以工代赈可以顺利实施，显著缓解

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压力，有效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必要的后勤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难民工厂为难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以工代赈的救助原则，积极引导难民群体以自身参与生产的方式实现自我生活保障，为边区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使难民群体成为边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

二、陕甘宁边区政府救助难民工作的成效

在中共中央初到陕甘宁边区时，陕甘宁边区最主要的产业是农业。由于陕甘宁自然条件恶劣，阻碍农业的发展，加之“占有少数人口的地主却霸占着60%~80%的土地，许多地主既是商人又是高利贷者”^[13]。农民需要以高额土地租金为代价向地主租种土地，从而难以有最基本的积蓄以维持农业的再生产，所以边区的经济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党中央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边区农业建设问题，但是边区地广人稀，地主掌握大量的荒地无人耕种，加之生产劳动力的不足导致农业生产也无法正常运行，朱德在讲述“南泥湾政策”时就曾指出“陕甘宁劳动力缺乏”^[14]这一问题。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难民救助措施，不仅改善了难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为边区经济的恢复以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大量荒地变良田，有效缓解陕甘宁边区“军需民食”问题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推进过程中，边区政府采取措施将地主所掌握的荒芜土地收回，并通过实施减租减息政策，使外来难民得以耕作，从而实现对难民的安置。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处理边区农业问题和难民问题方面，积极倡导并鼓励难民投入开荒生产中，使边区大量荒地变良田。打破边区原有地主垄断大量良田的局面，从而维持边区农业的持续再生产。以陇东分区为例，陇东分区先后开展安置移民、难民的工作，先后安置大批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来的移民、难民，鼓励和帮助他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陇东分区党委、专署为了促进他们尽快发展生产，结合当地具体条件，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和细则，这些政策不仅在耕牛、农具、种子及口粮等方面予以优待，还通过提供农贷帮助鼓励移民参加生产。1942年，“陇东分区各县安置难民529户、2281人。1943年，陇东根据地（含新正、新宁县）安置移民难民2100户、

7487人，当地政府为他们调剂土地9430亩，发放农业贷款37.8万元，帮助他们开荒2552亩，当年他们便生产粮食6.4万公斤。仅在1942年至1943年5月，新正县就安置难民1264户”^[15]。在当地政府的有力扶持和群众的积极互助下，大量荒地得以开垦为良田，大部分难民群体一年皆可独立经营，口粮自给自足，两三年便能实现富裕生活。不仅解决了边区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且实现了部分“余粮”到“军粮”的转变，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面对前线将士面临衣食短缺的紧迫局面，边区政府积极引导难民群众开展荒地开垦，收获了大量余粮，并支援至抗战前线。此举有效缓解了边区“军需民食”的紧张状况，为推动抗战胜利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陕甘宁边区经济得到恢复，群众生活供给得到保障

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各类救助活动，设立难民救助站，分发粮食和衣物，确保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这种政府与民众的紧密合作，有效缓解了难民的困境，极大提升了边区群众的生活信心，做到不使一人饿死或上山为盗匪，1942年，林伯渠主席在第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边区许多年都没有乞食的。”^[11]²⁷²边区政府在救助工作的同时，帮助解决生产资料、提供就业机会，使难民开始重建家业。为了应对大量难民带来的经济压力，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例如组织难民参与农业生产、重建基础设施等，通过开展“自救运动”，鼓励难民自给自足，增强其生产能力，边区的经济逐渐恢复，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另外，边区政府通过利用南京行政院的10万元拨款，建立了数个难民工厂。愿意工作者，有能力工作者，可以到政府设立的难民纺织厂、难民硝皮厂去做工，也可到造纸厂、印刷厂、化工厂中先做学徒，逐渐精进技术成为熟练工人甚至专业技术人员，从1943年5月至9月，边区难民工厂的工人收入在5斗小米以上的由占总人数的41%增长到55%，其中，月收入在8斗小米以上的则由1%上升到16%^[16]。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难民工厂的建立与发展，构建起“生产自救型”难民治理体系，开创了战时经济建设的独特范式。不仅增加了边区政府财政收入，还保障了边区军民生活供给，对提升抗战能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难民社会救助成效的显著，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感与行动力。

（三）难民吴满有树边区生产榜样，提振难民生活信心

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在物质上帮助，还在精神

层面激发难民的斗志和信心。这些难民在艰难的环境中变得更加积极向上,投入大生产以支援前线的伟大事业中,为最终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曾发表记者莫艾报道吴满有“民国十七年的秋天沦落到延安府,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不怕苦、不怕累,拼命劳动,通过艰苦奋斗,最终过上了好日子”^[17],并且于1943年1月11日又发表的社论中写道:“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18]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积极宣传倡导吴满有精神,向吴满有学习。吴满有的事迹在边区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当地民众注入了生活的信心。陕甘宁边区群众生活困难得以缓解,使边区群众对生活充满希望,推动边区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甘泉县清泉乡难民新村难民常庆福作为村民和母亲言道:“这个地方是好地方,树林多不缺柴烧,荒地多肯劳动不缺饭吃,有困难政府给解决,三年不出公粮,天下哪有这样好地方?”^[11]⁴²广大移民难民在生活得到保障之后编撰歌谣歌颂边区政府:“今年的生产大号召,那一个百姓不说好!”^[11]⁴³⁵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边区发难时歌唱出“边区就是咱的家;谁敢动它一星土,咱拿性命保卫它”^[11]⁴³⁶。林伯渠回忆道:“也无怪关中难民争着要移民英雄冯云鹏捎个意见到延安来”,感谢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边区政府^[19]。难民们对生活有了希望,就有了生产的动力,对革命的胜利也充满了希望。由此可见,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为边区难民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且深入思考了如何激发和提振难民的生活信心,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参与意识和对边区生活的认同感。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救助难民经验启示

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难民救助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救助方法和策略。这些宝贵的难民救助经验对现在的防灾减灾救灾及民生保障工作的开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一) 维护群众利益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始终将关注、关心、保障及改善民生作为其服务人民历史的核心原则和优良传统,这是党获得人民群众信任与支持的根本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构成了发展的终极目标,

保障与改善民生需聚焦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致力于为民众谋取更多利益、解决其忧虑,在发展过程中弥补民生短板,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确保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的发展中获得更强烈的满足感,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最大依靠。”^[20]在延安时期,边区政府面临财力窘迫,虽竭尽所能实施救助,但难民数量较多,仅仅依靠财政拨款和捐赠,无济于事,为此就必须依赖于广大民众的力量,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21]为此,党中央持续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22]保障民生福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党和国家一直以来不断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将“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3]作为主要学习内容,这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新时代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持续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深入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社会工作在强化民生保障体系中的关键作用。民生保障是社会工作的核心领域之一。确保并提升民生福祉,实现、维护并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发展成果普惠民生,使全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是赢得人民群众认可、支持与拥护的根本所在。

民生保障工作直接关系到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存权益,它既是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集中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民心工程。

(二) 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关键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我们尤其需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核心,必须坚持不懈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军民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0]⁸⁹²面对

边区物质资料严重匮乏的实际困难，党中央制定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10] 894}的财政经济总方针，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组织动员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将自身发展生产视为救助赈灾的重要途径，并在此过程中总结并积累宝贵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寓救助于生产”的救助原则，组织难民开垦荒地，引进新品种

农作物种植，组织难民兴修水利设施，组织合作社等措施发展自身生产，通过自身生产活动克服灾荒困境，有效利用难民的劳动力资源，提升边区的生产水平，从而将灾荒和难民问题的影响降至最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难民在得到妥善安置的同时也为陕甘宁边区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见表2）。

表2 延安增加劳动力及增加粮食统计表^{[24]508}

	劳动力（人）	增加粮食（石）
1938年	140	320
1939年	535	1 605
1940年	1 753	5 259
1941年	4 594	13 782
1942年	5 840	17 520
共计	12 862	38 486

注：原文献中共计数数据为12863和38586。

根据延安增加劳动力及粮食的统计，证明了通过组织生产活动，有效利用人力资源，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和粮食产量。随着劳动力的增加，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经济的自给自足，既增强了自身的生活保障，也为抗战前线的物资供应提供了一定的保障。1940年10月6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叶澜的文章《关于边区目前严重的救灾问题》，进一步说明救助难民灾民工作对于抗战的意义：“唯因其生活的安定，以及政府加诸人民政治文化教育之高度的发展，民众动员组织之有效的实施，使他们得悉力以赴抗战，参加了前后方的各项抗战工作，比如征兵、征粮等，这些具体事实的表现，正说明了抗日民主地区的人民，是怎样在抗战中真正发挥了他们巨大的力量。”^[25] 陕甘宁边区政府坚定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采取了“政府和人民配合起来做”^{[24] 484}的具体举措，把安置难民同开发边区与支持抗战紧密融合，通过鼓励难民开垦生产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实现了边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难民保障问题的协调解决，不仅妥善处理了难民救助问题，而且促进了边区经济进一步发展。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中央不断深化改革，为了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相关规定，其中就提出：“要深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

局。”^[26] 对于救助制度的改革，将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三）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是进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法宝

在延安时期，外来难民的救助不单单依靠政府快速的反应，更需要社会各界对政府的支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至关重要。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调集物资进行直接赈济，鼓励中共党员身先士卒带头捐款捐物参与劳动，同时积极向社会各界、海外爱国侨胞及国际友人申请援助，形成了全社会共同支持难民救助的良好氛围。面对部分边区外部援助被迫中断的挑战，鼓励边区群众之间互助合作，向地主和亲戚借贷粮食，恢复民间借贷机制，组织社会各界进行募捐活动等努力来渡过难关，延安时期政府与社会联动救助的措施至今仍被沿用，单单依靠政府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救助工作，实施会大打折扣。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面对突发灾情，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联动成为现如今灾害救助相关工作的主流，党中央颁布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工作原则就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群众自救，充分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作用。”^[27] 例如在2023年12月18日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发生6.2级地震后，甘肃各级政府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最快速度组织力量赶赴灾区进行救灾工作及灾后重建工作，在政府引导下社会团

体、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也迅速响应，通过网络平台、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援和援助工作。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紧密合作，不仅提高了救援效率，也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自我救助能力。在政府与社会联动救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结语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灵活的难民社会救助措施，多项措施并举，通过政府、社会以及个人共同奋斗，使难民得以妥善安置，不仅保障了边区的农业生产，维持了边区

社会的稳定和民众团结，还增强了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共渡难关的信念与集体凝聚力。在难民救助的成功实践中充分证明了在大灾大难面前，只有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才能创造出新的希望与生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难民社会救助彰显了中国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的团结奋斗精神。这种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要依托大数据平台精准识别需求，推进城乡救助资源整合，继续深化社会救助改革，不断完善健全民生保障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体权益，共创新时代美好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赵朝峰.当代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 [2] 王桢.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灾民安置工作述论[J].农业考古,2024(1).
- [3] 宋炜.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与启示——以陕甘宁边区移灾民和难民安置为个案[J].广西社会科学,2015(12).
-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 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民政志编委会.编纂.甘肃省志:第9卷·民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 [6]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268.
- [7]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13卷·水利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313.
- [8]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
- [9]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27.
-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活[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2]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147.
- [13]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3.
- [14] 谭幼萍.主编.朱德生平研究资料[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32.
- [15]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1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493—494.
- [16] 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51—252.
- [17] 中共延安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编.延安红色记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283.
- [18] 开展吴满有运动[N].解放日报,1943-01-11(1).
- [19] 林伯渠文集编辑组.林伯渠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39.
- [20]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24-01-01(1).
- [21]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J].中国经济周刊,2025(1).
- [22]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4-07-19(1).
- [23] 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J].求是,2022(8).
- [2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 [25] 叶澜.关于边区目前严重的救灾问题[N].新中华报,1940-10-06(4).
- [26]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 汪洋参加看望和讨论[N].人民日报,2022-03-07(1).
- [27] 国办印发《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N].人民日报,2016-03-25(6).

[责任编辑：解洪兴]